

# 我國國族認同的結構內涵與運作

呂宗麟

- 
- 一、前言：問題的呈現與研究目的
  - 二、國族認同的理論要義
    - (一) 心理認同
    - (二) 文化認同
  - 三、國族認同的結構內涵分析
    - (一) 分析體系
    - (二) 價值體系
    - (三) 遠景體系
  - 四、國族認同的運作方式分析
    - (一) 國族認同與政治符號的關係
    - (二) 國族認同政治符號化的運作
  - 五、我國當前國族認同之困境一代結語
- 註釋

## 一、前言：問題的呈現與研究目的

民族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，有其一定的份量，在許多國家與社群中，不論其在處理內部問題，或參涉國際政治體系，民族主義也有其影響力，由於民族主義的發展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意義，所以有些學者，遂將民族主義的性質，作用以及支持者（carrier）的角色歸屬畫分為若干階段的變遷息息相關，國內學者李錫銳先生以西方國家在政經變遷中民族主義的演進，曾提出三階段之說（註一），第一階段乃指中古政教合一帝國的瓦解，第二階段是從一七八九年到一九一四年民族主義延伸到中產階段，換言之乃指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興起，因為戰爭而推毀了歐洲的舊秩序，它代表著「人民主權」（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）觀念的衍生，第三階段係一九一四年之後，民族主義的普及，許多被壓迫的民族紛紛爭獨立，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的原因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新興民族國家日益增加，「族國建立」（nation building）的理論，成為當代西方學者研究民族與國家相關問題之學理依據。（註二）

族國建立的目標即在創鑄現代化的國家，而事實上，現代國家通常都是民族國家，由於英文的「nation」一字，在中文裏至少可以用民族與「國家」兩個觀念來理解，因此，往往容易造成語意上的混淆，例如「族國」與「國族」的意義常令人不知為何，致生誤解（註三），是故，本文首先就此一概念作適當釐清。

西方歐治學者雷嘉（Mostafa Rejai）依據「民族整合」與「政治主權」這兩者關係，認為，「族國」係大部份已開發國家，皆在政治權威結構形成制度化之前，即建立了民族認同感，如在歐洲出現的「nation—states」而「國族」係在大部份低度開發國家的情形，權威和主權超越了民族認同與文化整合，所以在亞洲與非洲，則產生了「state—nations」（註四）基本上，以民族為主，國家為輔者，族在前，國在後，可稱為「族國」以國家為主，民族為輔者，國在前，族在後，可稱為「國族」，主張「族國」者，要求同一民族之人全部歸屬一國，稱為「族國主義」，主張「國族」者，要求同一國界之內的所有族群互相同化與認同，則為「國族主義」（註五）就我國文化歷史觀察，誠如中山先生所說：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，在中國是適當的，在外國便不適當……國為中國白秦漢以來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。」（註六），中山先生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，因此本文中所指「民族認同」應與「國族認同」兩者之間並無衝突，內涵是一致的。

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主義，是一套針對國家所處環境適應時代環境挑戰，與生存發展的重要理論，其理論體系指陳出一開發中「國家，民族建立（nation—building），國家建造（state—building）的基本原則與規範，（註七）但在二十世紀的後期，我國在政經發展過程中，已朝向「已開發」國家邁進，然亦產生不少危機問題，如何透過適當方法與策略，藉此尋求解決當

前國家認同問題，誠屬重要，故本文嘗試透過心理與文化認同之理論系統，與分析、價值、遠景體系等研究途徑，剖析我國國族認同的理論要義、結構內涵，與政治符號（註八）在國族認同中的關係及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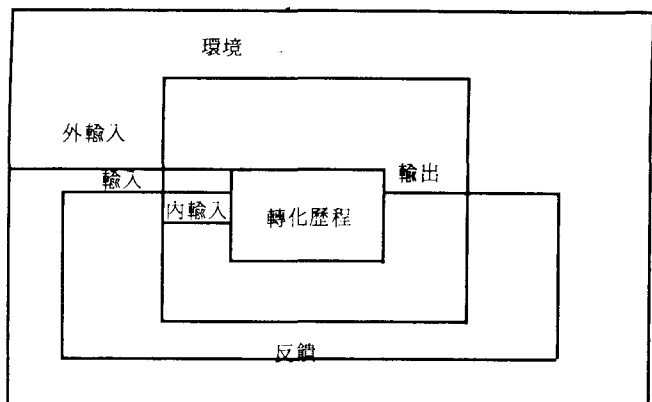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國族認同的理論要義

認同主要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現象，它的形成，是以個人認知（*cognition*）為基點，經過不斷的思想過程，引申到團體，所以這必然牽涉到心理學中所討論的認知、理解及符號；等形成的因素（註九）雖然，認同往往來自個別的現象，但個別的認同往往是經由認同團體的文化所影響而成，雖然就國族認同的性質而言，可區分為心理與文化兩方面，但要嚴格區分，實有困難，因個人乃至團體的認同，均不能免除內外文化氣圍的影響，認同發生在對個體的認同，同樣也發在對他的團體文化認同之上，而文化認同的結構，不能免除個別及至團體的心理認知，是故，將國族認同區分為心理認同與文化認同兩類，分析其主要意義如下：

### （一）心理認同：

馬起華教授對民族認同（此處民族認同對我國而言，應同於國族認同）的心理結構，歸納有移置的認同（*displacement identification*）知覺的認同（*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*）與發展的認同（*developmental identification*）三種（註十）

1. 移置的認同：這是設身處地，易位而處的一種心理，在群衆心理學中，個人往往有恃衆性，國族中的成員亦同樣有恃衆性，唯此種恃衆性，必須自行認為屬於該一團體，而為其中一員，且由於有內在與外在的差異，如語言，文字、宗教、風俗禮儀；等不同，各個不同的成員在接觸時就會感覺自己屬於這個國族，由於這種認知歸屬心理，於是和國族中其他成員發生移情作用（*empathy*），移情作用是個人居於他人的地位，而分享其經驗、情緒；乃至好惡等。



圖一

2. 知覺的認同：這是確認兩件事為同一 (identical)，或解釋兩件事有相同的意義或性質，由於知覺作用，使兩件事本來可能有關係，或本來不相關連的事務，產生相同的意義或等價關係 (equivalence) 因而可能引起相對應的行為，所有象徵和代表國家、民族的事務或符號，都和國家、民族有等價的意義與性質，例如，在古代部落國家 (tribenation) 以圖騰 (totem) 為其始祖所從出的某種物體，或由其首領採藉來統御部眾的物體，部落氏族或族群所有成員，認定該圖騰與上述團體產生同樣的意義與價值。

3. 發展的認同：此種認同是吸收認同各體某種特質的一種心理歷程，所吸收的特質，是認同主體認為優良，而己身所缺少的，吸收的方式有攝取 (introjection) 和模仿 (imitation) 一個團體中傑出的人物，團體的特質亦可攝取和模仿，一個國族能够生有發展，往往有某些特質世代傳承，其中或者經由社會化：等過程，攝取與模仿了這些特質，就國族認同的心理系統，本文擬透過系統模型（註十一）再加以說明。

因為國族本身是一種政治系統，無論其中任何成員，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環境可分為外，內在環境，前者如國際，地理等因素，後者如成員的願望與要求，環境構成了刺激，亦即輸入 (inputs)，外環境發生外輸入 (external inputs) 如當異族人侵之時，民族思想、愛國情緒將會高漲，然國族所處的環境的環境，及其對於環境刺激的反應型態，以及國族本身的命運，均與國族思想體系，有直接或間接關係，中山先生認為「民族主義之範圍，有以血統，宗教為歸者，有以歷史，習尚為歸者，語言文字為歸者，莫乎遠矣。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，則以意志為歸者也。」（註一二）就本質而言，若無共同意志，國族主義將難以發展，內環境發生內輸入 (internal inputs) 國族意志形或內輸入的主要根源，輸入經轉化歷程 (conversion process) 在轉化歷程中包括移置性、知覺性、發展性不同的心理認同結構。而成為決定國族的反應，此反應稱為輸出 (outputs)，亦即認同的目標與強弱的顯現刺激不同，反應亦異，輸出是輸入的函數，反應影響刺激，復引起環境的回應，此歷程稱之為反饋 (feedback)，國族的生存發展，就在一定的、或變動不已的環境中輸入、輸出、反饋一系列活動流程（如圖一）

## (二) 文化認同

由於迄今尚難對「文化」一詞，有一公認且清晰的界定，因此，相對而來，處理有關文化認同」的問題，就顯得困難，不過，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曾言：「大凡一個國家，所以能够強盛的緣故，起初的時候，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，繼之以種文化的發揚，便能成功。」本文對「文化」的定義，係定位在不同於單一血統、種族之外的廣泛意義，就我國國族認同的文化性質而言，中國並不是建立在狹隘的種族意識，更重要的是建在廣泛文化基礎上，換言之，就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，涉及種族之處，多著眼於文化之殊別，依派克 (Robert E. Park) 與蒲士 (Ernest W. Burgess) 的看法，中國係靠民族同化逐漸融合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 (註一三)，當然「民族同化」必然根植於「民族認同」(民族認同此處即是國族認同) 文化認同應可促進國族的發展，儒家認為「夷狄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」就是文化的作用。

就形成國族文化認同的主要因素而言，「原始情感」與「利益」應是值得思考的兩個層面，原始情感應是一種心靈的結構，其基礎還是受到文化的影響所致，認同是與生俱存的，文化認同的原始情感，仰賴文化規範 (culture norms) 所陶鑄，這種規範包括國族中影響每個人全部價值觀念的所有事物，如文字的書寫、家族的維繫，尤其是透過生婚死別的禮俗，來達成 (註一四)，利益層面，基本上，應受到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影響，例如，在亞洲若干新興國家，為加速當地華人社會的結構改變，達到所需要的文化認同，必然借助於政治規範 (political norms) 來促成華僑其對所在國家的認同，此種方式並能防禦兩種立即的威脅，一個是強烈的華僑族群的威脅，害怕它自內部削弱新興國的穩固，一個是外來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威脅，害怕它透過大規模的資本投資，來把持國家的經濟 (註一五)，強制性的政治與社經規範就成為這些國家常使用的方法。

## 三、國族認同的結構內涵分析

構成一完整的學理，應包括理論系統中的所有要素、內涵、作用、影響等，各學者也無不嘗試透過其知識、智慧、方法論、冀希能建構完整的系統理論，甚或架構義理，作為分析、判斷的依據，近數十年來，國內「孫文思想」的研究，藉由社會科學的方法與架構，雖開展出不少新的方向，但是在民族問題上的研究，仍屬不足，而「國族認同」更非衆多學者研究興趣之所在，因此，無法找出完整建構國族認同的學理系統，本文擬透過分析體系（analysis system）價值體系（value system）與遠景體系（vision system），作為分析國族認同結構內涵的主要方向。

### （一）分析體系

分析體系的目的，在於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解分析，作為內在成員產生合理認知的的主要根據，就本質而論，國族認同係建立在心理認知的體系之中，換句話說，認同是一種心理現象，而認知應是心理形成的一種過程，例如，在認知過程中，我們常以種族、國籍：等，作為畫分為若干類型的依據，且每一類型的歸類，主要在於具備若干相關特質，我們稱之為認知體系中的類化原則（stereotyping）（註一六），就我國在國族認同的發展過程中，不可諱言，家族與宗族的觀念，頗重於各人對國族的想法，由於「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教團體，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。」（註一七），亦即我國在家族、宗族的認知體系中，運出家譜、宗祠：等，加以運用並加強其認知作用，而輕忽國族；如何以家族、宗族為基礎，透過認知體系，達到我國所需要強化的國族思想，就顯得特別重要，中山先生曾認為：「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：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，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。」（註一八）

美國政治學者柏克（Edmund Burke）曾提出「忠誠的層級」觀念（hierarchy of loyalties），他認為，人對其家族、及所屬的地區是忠誠的，這是非常白然的，每一階層的忠誠，在其範圍內，是至高無上的，整個忠誠的層級體系亦完全是自然的，因為整個體系是傳統的，因此，民族應該尊重並鼓勵此種忠誠，作為愛護一個廣泛民族的必要條件（註一九）中山先生以家族、宗族作為組成與組合對國族的忠誠，這個觀點與柏克有相類的地方。

就我國國族認同的分析體系而言，係以家族、宗教為基礎，透過內在心理的認知與適當符號化，達成對國族的忠誠。

## (二) 價值體系

所謂價值體系，係指表明團體的積極，且具有創造性的存在理由，指示團體的目標或方向，對於成員灌輸神聖的使命感（註二十），據此而論，由於數千年來，漢民族的融合不斷地與其他少數民族在進行，且就融合的力量而論，文化的認同，大於血統的融合，也由於此種原因，在中國疆域之內，形成中國文化、道統，及至特有的民族特質，民族認同是形成與融合成中華文化的主要中心結構，也形成中華民族積極創造存在的價值體系。

金耀基先生認為：「中國傳統的社會，嚴格來說不算一個政治體，而是一個文化體，維繫古中華帝國的統緒與合諧者，主要的是以儒家思想的中心價值體系。」（註二一）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也同樣認為：「中國實為一文化體，而非國家。」（註二二）「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」（杜甫語）中國傳統中國民眾缺乏對政治的認識，也因而欠缺對國家整體認同的觀念，因此，就我國國族認同的價值體系而言，應在國族的結構之下，本「王道文化」為基礎，以「倫理道德」為本質，恢宏中華文化，以此文化體系結合國家政治的機制，俾使得我國能與歐美並駕齊驅，乃至迎頭趕上。

## (三) 遠景體系

中山先生對國族主義的遠景體系，即是其所理想憧憬的世界大同，換句話說，大同世界是中山先生國族主義的最高理想，民國元年九月他在「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」講詞中「主張和平、主張大同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幸福，由中國人保障之。」（註二三）另在「軍人精神教育」中表示「在吾國數千年前，孔子有言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如此，則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人人不獨子其子，是為大同世界，大同世界即所謂「天下為公」，要仗老者有所養，壯者有所營，幼者有所教，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，然後不見可欲，則民不爭，甲兵亦可以不用矣。」（註二四）中山先生的大世界乃是源於中華文化，一脈

傳承我國儒家之正道，所以中山先生的國族主義並非狹隘的漢族中心主義，而是用中華文化去感化影響其他民族，以服務為目的」的新人生觀，希能促進世界大同的具體實現。

要達成中山先生理想大同世界，必然先根源於我國的國族認同，以此為基礎，達到「以中國為一人，以天下為一家」的境界，即中山先生所說：「最光榮之偉績，由中國人建樹之，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，並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。」（註二五）

#### 四、國族認同的運作方式分析

要達成與強化國族認同的認知及效果，可經由教育、宣導、傳播；等方式促成，不過，藉由政治符號的運用，應係可行的一種方式，茲分別說明，國族認同與政治符號的關係，乃至運作的方式。

##### （一）國族認同與政治符號的關係

美國政治學者樓文斯汀（Karl Loewenstein）在其「政治符號的影響（The influence of symbols of politics）」一文中，對符號的作用曾有下列的描述：「符號乃轉化抽象而為具體實在之事物，人類感官對符號一經感知，透過聯想，而喚起對此符號所代表原物的觀念，則符號乃為其所代表物之媒介，雖原物不在目前，而心可得而確實明瞭。」（註二六）基本上當人類的認知領域逐漸擴大與複雜化時，在接受與起作用之間，就會產生若干「符號系統」（註二七）

在上述符號系統中包括三個基本要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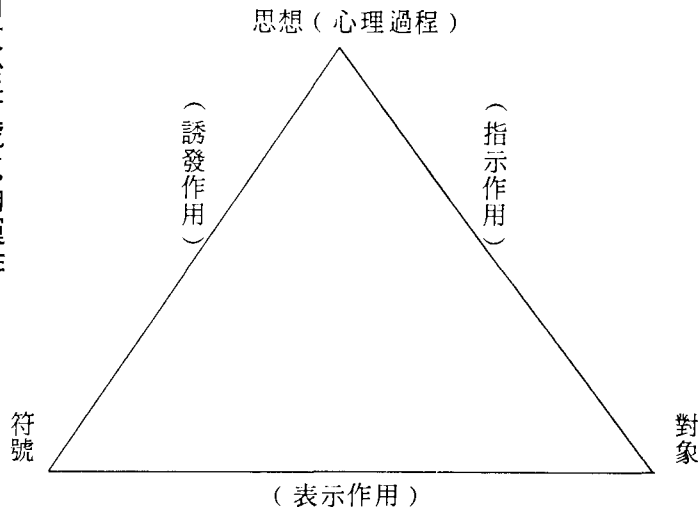
1. 使用符號時的心理思考過程（mental process）
2. 符號本身（symbol）
3. 依符號所指示的對象或事物（referent or thing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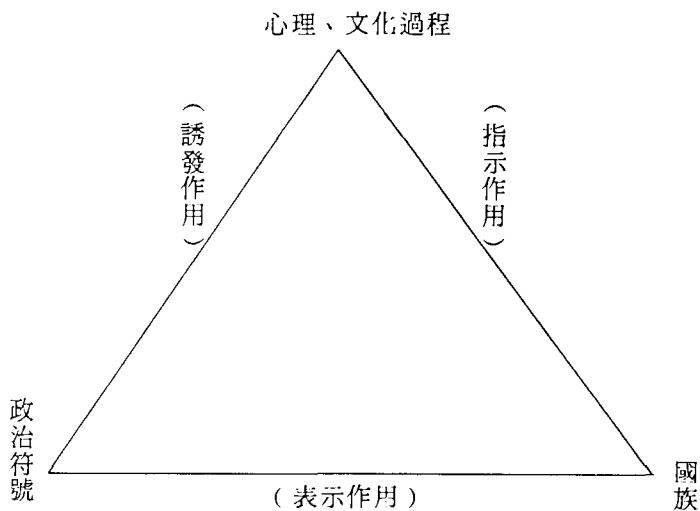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人們在接受與認知時，由於每個人參考架構（reference frame）的殊異、經驗範圍的不同，以及未諳符號的內在意義，以致在符號認知過程中會產生曲解或誤解，唯經由選擇適宜的政治符號，透過成員心理思考的過程，獲得正確的意義，應可達成國族認同強度的增加。（如圖二、三）

## (二) 國族認同政治符號化的運作

政治符號運用在國族認同的結構上時，通常以下列兩種方式為之：一為強制性的作為或絕對支配的方式，另外一種為透過



圖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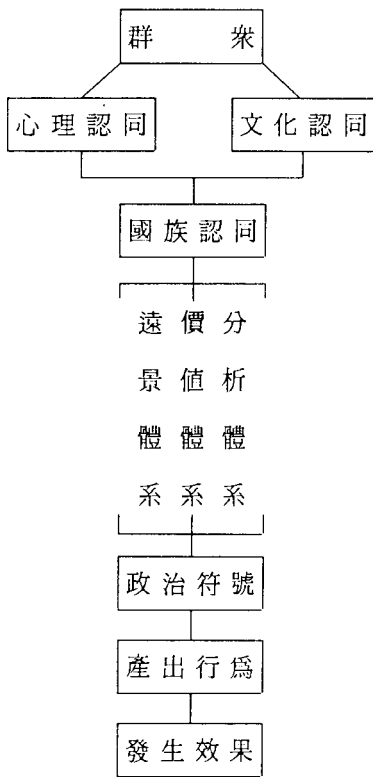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

民主程序，和平而非獨裁的方法，就我國在漢民族與異民族融合過程中，雖曾發生若干次戰爭，然並未造成級此問「絕對」的仇恨，誠如中國古哲所說，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（註二八）「故遠人不服，則文德以來之。」（註二九），也由於仁德的觀念，所以在我國國族認同的過程中，透過政治符號的適當運用，不致產生不良的影響。

一般而言，分析體系與價值體系等相互影響作用，共同一致轉換於具體行動中，即落實在實際的現實政治社會中，它必須經由政治符號系統運作，才能達到增強體系的作用。

灌輸國族成員的認同信念，加強對「政治符號」的輸誠效忠，將可加強整個國族認同系統影響力量，所以，就整個國族認同內部的轉化演變方式，應為政治符號的運作過程，換言之，政治符號的運作在整個國族認知系統中，扮演重要的運作樞紐地位，茲將其運作方式系統圖示於（圖四）。



（圖四）

## 五、我國當前國族認同之困境——代結語

我國現正處於開發中，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的地位，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洵 (Lucian W. pye) 在其「政治發展的方  
向」(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) 一書中，強調開發中國家將面臨六項危機問題(註三十)白氏列六項危機之首，即為  
認同的危機 (crisis of identity) 同樣地也發生在我國，就國族而言，認同的危機乃指對整個國族認同的問題，與個人在認同  
中所產生的問題。

我國當前的國族認同危機不屬於族裔危機，同樣均為中國人，也不是種族問題，而是在國族認知上的認同問題，隔離主義  
與分離主義的隔閡，而互不信任，及在政治層面的種種充滿諸多變數的考量，符號乃至政治符號所象徵及代表意義上的差異，  
形成理解層面的不同與不夠，造成意義上認知，乃至認同的危機，要解決此種危機問題，應先從加強陶鑄共同認知與瞭解的政  
治符號運作著手，法國社會學者黎朋 (Gustave Le Bon) 在其名著「群眾一大眾心理」(The Crowd: A study of the popular  
mind) 一書中表示「群之為物，喻之以理則難，鼓之以動則易。」(註三一)法國克雷蒙梭 (George Clemenceau) 認為：「沒  
有東西像符號，那樣的有傳感性。」(註三二)透過激發民衆的主體一政治符號，並加以有效地運用，除可加強對認同的強度  
外，應能有利於解決我國當前國族認同危機的困境。

### 註釋

註一：參閱：李錫鋸：民族主義與國家整合危機之解決，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，憲政思潮第五十六期民國七十年十二月，頁  
86。

註二：參閱：Walker Connor 著、任元杰譯：「族國建立」理論的反省與評估，見憲政思潮第七十一期，七十四年九月，頁119  
—134。

- 註三：參見，朱浚源：「族國」與「國族」研究專號序，台北思與言雜誌第三十卷第二期，八十一年六月，序1—6。
- 註四：Mostafa Rejai等著，王昭麟譯：民族國家與國家民族（Nation states and State nations）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，中山社會科學譯粹第二卷第二期，頁10。
- 註五：同註3書，序2。
- 註六：孫中山：「民族主義第一講」國父全集（以下簡稱全集）第一冊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六十二年），頁2。
- 註七：巨克毅：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結構內涵與運作功能，台北近代中國第五十七期，七十六年二月，頁28。
- 註八：依據美國當代政治學者拉斯威爾（Harold Lasswell）與坎卜蘭（Abraham Kaplan）認為：政治符號的內容包括一些熟知的權威（含半權威的）型式如憲法、憲章、法律條約等，另尚包括政綱、標語、政治理論、社論等 Ref:Harold D.L. asswell & Abraham Kaplan: Power and Society: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. (Rainbow Bridge Book Co. Taipei, 1971) P.103.
- 註九：張華葆：社會心理學，台北三民書局，七十交年九月三版，頁50。
- 註十：參閱：馬起華：三民主義的心理研究，台北育英出版社，七十四年九月初版，頁65—67。
- 註一一：本文採用伊斯頓（David Easton）及馬起華之政治系統為參考之依據。
- Ref: David Easton: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. (N.Y. Wiley, 1957) P.32.
- 馬起華：政治學原理（下冊）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，七十八年八月再版，頁1041—1042。
- 註一二：孫中山：「文言本三民主義」全集第二冊，頁155。
- 註一三：Robert E. Park and Ernest W. Burgess: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, Univ. of Chicago press. 1924) P. 735.
- 註一四：王慶武：論東南亞華人認同之研究，同註3書，頁166—167。
- 註一五：同前註書，頁165。
- 註一六：同註九。
- 註一七：孫中山：「民族主義第五講」，全集第二冊，頁50。

- 註一八：同前註。
- 註一九：參閱：楊逢泰：民族自決的理論與實際，台北正中書局，六十五年二月，頁135。
- 註二十：參閱：巨克毅：意識型態傳播與國家發展，台北正中書局，七十六年五月台初版，頁59。
- 註二一：金耀基：中國現代人與知識份子，台北時報文化公司，六十七年十二月三版，頁17。
- 註二二：引自：梁漱溟：中國文化要義，台北問學出版社，六十六年十一月，頁19。
- 註二三：孫中山：「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」，全集第二冊，頁259。
- 註二四：孫中山：「軍人精神教育」全集第二冊，頁502。
- 註二五：同註23書，頁359—260。
- 註二六：K. Leowenstein: The Influence of symbols of politics. (N. Y. Thomad Y. Crowell Co. 1946) chapter III, P. 64.
- 註二七：參閱：同20書，頁93。
- 註二八：孟子，梁惠王篇。
- 註二九：論語，季氏篇。
- 註三十：Ref: Lucian W. Pye: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. (Boston, Little Brown & company, 1966) P. 62—67.
- 註三一：吳旭初等譯：群眾心理學，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，出版時不詳，導言。
- 註三二：曾虛白：民意原理，台北新聞記者公會，六十三年九月初版，頁102。